

# 宋代图经与九域图志： 从资料到系统知识<sup>\*</sup>

潘 晟

**摘 要：**宋初，州郡一级政区的图经，作为官文书向上奏进，属于档案。朝廷根据这些州郡图经，依据统治需要，再组织人员修撰成“天下图经”，成一代之著述。在《祥符图经》前，州郡所上多为胥吏编集而成，此后则主要由文学之士负责。而此种变化，对于图经在宋代之演变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推进了州郡图经由档案资料而为系统著述的进程，使档案知识转而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能够在较广范围内传播的地理书，其知识从档案性质的秘密的权力资料，转而成为具有权威性和可公开传播的知识；另一方面，在王朝政治变迁中，它又逐渐被其他形式所取代。崇宁间“九域图志所”的设置，进一步改变了依据地方定期奏报资料编纂王朝地理书的做法，而直接设置编纂机构，以临时奏进之资料及各类著述为基础编辑王朝地理书。至此，定期的州郡地理资料奏进制度基本被废止，王朝地理知识完全从档案式资料的生产走向设官置局的系统性知识生产。

**关键词：**宋代 图经 九域图志 档案 系统知识

通过相应的行政制度，获得疆理天下的地理知识，为历代王朝统治所经常之政事。但是真正在政治体制中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并因此成为主导这一知识系统发展的主要因素，仅就现存文献记载而言，则自唐发达，自宋盛行而为转折。其盛行而转折的关键，则是北宋时期得到较好推行的闰年之制以及图经编纂在两宋之际逐渐废止，入南宋后转而被郡县志全面取代。这种转变对于地理学知识的发展与其内在的权力因素有何种关联？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考虑到相关问题较为繁杂，故本文试图在前辈时贤讨论的基础上，<sup>①</sup> 仅从北宋图经与九

<sup>\*</sup> 本文为南京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 1209005）中期成果之一。本文以博士学位论文相关部分为基础，之后又根据《历史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做了较大修改，在此对导师唐晓峰先生及匿名审稿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sup>①</sup> 关于图经、闰年制度的讨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方志学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古代社会地方—中央行政运作之基础，向为学术界所关注，因此相关的成果极为丰富。代表性专著有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黄苇等编著：《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等等。

域图志的角度入手,来观察其背后知识累积及形态转变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供讨论古代知识结构演变参考。

## 一、宋代的图经:王朝疆域地理知识从档案资料走向著述

王朝时期对疆域地理资料的搜集,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从《周礼》的记载即能窥见一斑,<sup>①</sup>而《汉书·地理志》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这一传统的佐证。虽然如此,关于王朝疆域地理资料的搜集传统,<sup>②</sup>在唐代以前的具体运作方式,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而唐宋时期较为普遍的图经,被认为有着较早的来源。<sup>③</sup>历来众说纷纭之图经,作为王朝疆域地理资料收集的一种手段,因记载缺乏,其汉隋之间的变化尚不能做深入推测。至于唐代,当地图造送制度正常运行时,亦可能要求随例造送文字性质的图经,两者属于不同形式的地理公牒,地图为正,图经为附属。图经之循例或不一定如闰年图那样稳定。随着制度运行的涣散,文字形式的图经因编造的技术性低,往往循例抄送即可。但为解决地理地形问题,或将已绘之小幅地图附文随上,即成后世所谓先图后文之形式。<sup>④</sup>

### (一) 宋初图经的继承

关于宋初图经,《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记载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性质与形式:

是日,遣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及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命中书舍人徐锴等通夕讎对,送与之,多逊乃发。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归,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状。<sup>⑤</sup>

卢多逊负责“重修天下图经”起于开宝四年(971)春,此时北宋尚未平定南方诸国及北汉,因此难以具备“天下”各地之新地理资料,其书“讫不克成”,<sup>⑥</sup>亦在情理之中。然而宋廷此举无疑显示了其统一天下的雄心,向尚未归附的各割据政权发出明确信息,“重修天下图经”是其政治上重要之象征手段。

就学术史而言,上述引文向我们透露的关于当时图经修撰的信息更为重要。首先,此次修

① 关于《周礼》的地理学史价值,详见辛德勇:《〈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② 关于王朝疆域地理的理论阐释,请参阅 Tang Xiaofeng, *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2000; 唐晓峰:《中国古代王朝地理学述论》,“北大论坛”论文集编委编:《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考察——第二届“北大论坛”论文集(200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117页;《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③ 在搜集疆域地理资料的传统中,与图经密切相关的是闰年图制度,对此吴松弟在讨论宋代户口统计制度的时候,已有较系统的梳理,详见氏著:《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因讨论目的不同,相异之处不一一辩驳。

④ 相关学术史及讨论,参见潘晟:《图经源流再讨论》,《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1期。

⑤ 《长编》卷14,开宝六年夏四月辛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9页。

⑥ 《长编》卷12,开宝四年春正月戊午,第259页。

撰既称“重修天下图经”，当有所本，应当为祖述前代制度而来。<sup>①</sup>其次，宋初天下图经的修撰工作由史馆负责，这或为后来“九域图志所”之滥觞。第三，当时南唐州郡图经的实行似较有效，否则难以在短时间内抄送给北宋使臣卢多逊。这或许说明，割据时期各政权出于内外政治与军事斗争压力，地方资源之掌握与搜刮乃日常行政之迫切工作，故而此类官文书编制在相当的程度上反较承平时期为有效。第四，推测南唐政府所存各州图经为官方案牘文书，并无多余之副本，只能临时抄写。上述虽只是南唐的状况，但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综上，五代末至宋初，州郡一级政区的图经，作为官文书向上奏进，属于案牘。朝廷根据这些州郡图经，依据统治需要，再组织人员修撰成“天下图经”，成一代之著述。这一过程使大量的疆域地理资料，从案牘文书一变而为著述；使档案式的地理资料转而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能够在较广范围内传播的地理书；其知识从档案性质的秘密的权力资料，经过加工、删削等整饬，转而为具有权威性知识和可传播性知识的双重性。

虽然卢多逊开宝四年主持重修“天下图经”“讫不克成”，但开宝八年宋准却“受诏修定诸道图经”。<sup>②</sup>既云“修定”，似当时确已成书。

## （二）景德、祥符年间图经之发展

开宝八年后，史籍再次记载大规模修撰天下图经已在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至大中祥符间。<sup>③</sup>景德四年二月，宋真宗巡幸洛阳，浏览《西京图经》时，因其颇多疏漏，遂“令诸道州、府、军、监选文学官校正图经，补其阙略来上，命知制诰孙仅等总校之。仅等言诸道所上，体制不一，遂请创例重修，奏可”。<sup>④</sup>景德四年的这次图经修撰活动，一直延续到大中祥符年间。

此次修撰，相关记载颇为分散，<sup>⑤</sup>以《玉海》记载较详：

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学士邢昺、吕祐之、杜镐、戚纶、陈彭年編集车驾所经古迹。庚辰（十三日，一云十四日敕），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及诸路以图经献，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直集贤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林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又增张知白、晏殊，又择选人李垂、韩羲等六人参其事。

祥符元年四月戊午，龙图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仍赐中书、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阅。从之。

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宗谔等上之。诏嘉奖赐器币。命宗谔为序。又诏，重修定大小图经，令职方牒诸州，谨其藏，每闰依本录进。

① 今所见唐代文献并未有修撰天下图经的明确记载，即以《元和郡县图志》而言，李吉甫在序言中亦未提及当时有此类工作；且从序言推测，其工作并非制度性的定期活动，个人行为的色彩更浓厚些。结合王溥《五代会要》的记载，推测宋初所能追述的制度起源可能在于晚唐、五代。（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

② 《宋史》卷440《宋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23页。

③ 关于《祥符图经》，可参见方豪：《宋祥符州县图经初探》，《史学集刊》（台北）1970年第2期（秋季），第57—70页。

④ 《长编》卷65，景德四年二月己卯，第1445页。

⑤ 参见《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戊午，第1537页；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第1697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697页。《宋史》卷7《真宗本纪二》，第145页；卷265《李昉附子宗谔传》，第9143页。

.....

凡京府二，次府八，州三百五十二，军四十五，监十四，县千二百五十三。

祥符四年八月十八日中书门下牒，别写录颁下诸道图经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sup>①</sup>

又，李宗谔《祥符图经》序曰：

夏载弼成于五服，职方周知于数要……今闰年诸州上地图亦其比也。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

景德丁未岁……览山河之形胜，酌方志之前闻，敕土训而夹车，校地官之著籍，亟诏方州，精加综辑，曾未半载，悉上送官。毛举百代，派引九流。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臣广备之法。立言之本，劝戒为宗。守令循良，罔不采寻。峻良攸产，往牒备传。自余经界之疆畔，道里之途遐，版赋耗登，轨迹昭晦，土毛良苦，气俗刚柔，具有差品，无相夺伦。<sup>②</sup>

综合上述史料，此次图经修撰活动所涉及之问题大致有以下数端：

1. 此次修撰天下图经，大端源于宋真宗巡幸山河之需要。

2. 图经修撰经过大约如下：景德四年二月己卯，宋真宗浏览《西京图经》，因其缺略，遂令诸路州、府、军、监，选文学官校正后再奏进。依上引《玉海》记载，这时各州府所上图经主要将“古迹”补入其中。约半年的时间，各州府图经即悉数奏上。令知制诰孙仅等校正，主要参与者尚有戚纶、王随、宋绶、邵焕。因各州府所上图经体例不一，孙仅提出创立体例，重新编撰。此意见得到批准，朝廷遂令李宗谔、王曾领其事。主要参与者尚有：张知白、晏殊、李垂、韩羲、秦唐佐、王夷简、刘爽等。<sup>③</sup>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丁巳，历时四载而书成，由李宗谔等奏进。全书凡1566卷，包括目录2卷。其名称，依《长编》，为《新修诸道图经》，因其成书于祥符年间，故宋人一般称其为《祥符图经》，后世如之。至祥符四年八月，又令“别写录颁下诸道图经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sup>④</sup>此后各地州郡所云《祥符图经》，应即指此次所颁布图经新本而言。《玉海》“重修定大小图经”，所谓“大图经”，似并非指《新修诸道图经》，而是诸道（诸路）之图经。即如《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所载《京东路图经》、《京西路图经》、《河北路图经》等路分图经。<sup>⑤</sup>至于“小图经”，似指各府、州、军、监等州一级政区之图经。

3. 宋代图经之制，至此发生明显变化。其一，各州府图经编撰人员，明确要求“选文学官校正”，则此前图经造送大率并非如此，似由胥吏循例而为。此次选文学官校正，实为州府图经

① 《玉海》卷14《地理·地理书》，“祥符州县图经”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73—275页。

② 《玉海》卷14《地理·地理书》，“祥符州县图经”条，第273—275页。

③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第4736页。

④ 此处尚有疑惑。当时《图经》包括“京府二，次府八，州三百五十二，军四十五，监十四，县千二百五十三”，故所颁新本，若是州府军监仅录其本辖区之内容，则“三百四十二本”无法一一对应；若是各州郡颁布全书一部，则总共1566卷，写成后合为342本，其工程亦至为浩大，恐难以实现。另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祥符四年所颁图经至南宋后期陈氏撰述之时，“皆散亡，馆中仅存九十八卷”，而其家则有“苏、越、黄三州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由此推测，虽然《玉海》记载祥符间所颁新本为写本，然各地或曾将本州郡之本开雕印行。此尚待详考。

⑤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1，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1辑上册，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第271页。

辑纂人员之一大变化。其二，既然景德四年各地所上的图经体制不一，则从北宋开国至景德间，情况当亦复如是，各州郡图经并无统一体例。进而推测，开宝八年宋准等修定之诸道图经，可能也没有统一撰述体例。故孙仅等人提出创立新制，划一体例，为宋代图经发展重要事件。大中祥符三年成书后，明确诏令诸州依颁布新本，每闰录进，则此后诸州图经修撰多以《祥符图经》为凡本。其三，以大中祥符三年为界，之前诸州图经之修撰或并无一定之周期，此后每闰依《祥符图经》之本录进。<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此制度可能行之未远，至神宗朝或已不再严格遵循。如元丰七年（1084）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云：“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记述也。”<sup>②</sup>若此记载不误，则大中祥符三年所诏各州郡此后每闰依本录进图经之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实行，至少元丰时期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朱长文不应有此感叹。另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黄州图经》四卷，《附录》一卷。李宗谔祥符所修《图经》，亦颇有后人附益者。郡守李訢又以近事为《附录》焉”。<sup>③</sup>则祥符后州郡图经内容多因循之，往往只作局部附益。李訢，南宋乾道间守黄州，则至此时各地方州郡还往往以《祥符图经》为当地地理资料之基础。这一方面表明《祥符图经》编修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祥符后地方州郡图经编修并不发达，很可能是“依旧本”而不一定“录进”。官僚体制的因循，成为图经在北宋后期日渐式微的重要诱因。

4.《祥符图经》之体例，因世无传本，依据零星记载实难揣测。大致或如前引李宗谔序言所云，主要包括境界、道里、版赋、土地物产、风俗民气、官守吏员等。

不过，依据大中祥符三年所下“每闰依本录进”之诏令，则此后之州郡图经，其体例当多本于是。因此，最终成书于元丰七年之《吴郡图经续记》（详见下文），其体例似有参考价值。该书3卷，各卷类例如下：

卷上：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亭馆、海道、牧守、人物；

卷中：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

卷下：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

然该书“凡《图经》已备者不录，素所未知则阙如也”。<sup>④</sup>其体例并非全依《祥符图经》，其中最重要之“境界、道里”，即未见记载。

相比之下，今存残本《严州图经》，虽成书于南宋，且前后续修，然绍兴重修时体例大致仍依祥符旧规；<sup>⑤</sup>淳熙再修时，体例则依绍兴之旧。<sup>⑥</sup>故今所见淳熙本《严州图经》之体例更能反映祥符时图经状况。其类例如下：

图：子城图、建德府内外城图、府境总图、建德县境图、淳安县境图、桐庐县境图、遂安县境图、寿昌县境图、分水县境图。

① 目力所及，未见史料明确记载祥符前有闰年上图经之制度，只有祥符三年诏令每闰依本录进。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相关讨论对图经与闰年图一般不作区分，而就目前文献记载，宋代闰年图在淳化四年（990）即下诏两闰一造，因此图经与闰年图之发展并非同步。（详细论述参见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8年，第58—62页）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金菊林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第252页。

④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吴郡图经续记》卷首，第1—2页。

⑤ 董弁：《严州重修图经序》，陈公亮修：《严州图经》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14页。

⑥ 刘文富：《重修图经序》，陈公亮修：《严州图经》卷首，第7—9页。

卷1: (严州) 历代沿革、分野、风俗、州境道路附、城社、户口、学校科举附、廨舍、馆驿楼阁亭榭、仓场库务铸钱监附、军营兵籍附、坊市、桥梁、沟渠、物产、土贡、税赋茶租免役和预买附、寺观、祠庙坛壝附、古迹、贤牧题名附、学校、登科记宗姓及童子武举附、人物、碑碣。

卷2: (建德县) 历代沿革、县境道路附、社、乡里、户口、工廨舍、知县题名、馆驿亭附、土贡、税赋茶租免役和预买附、寺观、祠庙、山岩洞附、水溪滩津渡湖泊附、古迹、贤令、人物、碑碣、坟墓。

卷3: (淳安县) 历代沿革、县境、城社、乡里、户口、学校、廨舍、馆驿、仓务、土贡、税赋茶租免役和预买附、寺观、祠庙、山、水溪滩津渡附、古迹。

又,第3卷末页,其文为“右建德府《府境图》。东西三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三十里”云云。<sup>①</sup>似为卷首“府境总图”之图说,不知何时散落。若是,则原本各图后当还附有图说。

淳熙《严州图经》虽仅存3卷,但州、县两级之体例具可见,所佚者或为其余各县之具体记载而已。因此,若今存董弁、刘文富二序不差,则此体例当去《祥符图经》不致太远。

5. 图与经之关系。李宗谓《祥符图经》序明确指出图与经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并不存在主从关系。<sup>②</sup> 这可以找到一些佐证,如欧阳修作于庆历六年(1046)前后的《菱溪石记》云:“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菱溪,按图与经皆不载。”<sup>③</sup> 从文意,图与经各自相对独立。

李宗谓《祥符图经》序,所描述图经修撰内容似亦为文字形式,而未明确记述图绘情状。如此重大事件、重要撰述,若绘有大量地图,不致一语不加。若仔细观察李宗谓序言,其中已透露机关。尤其是“今闰年诸州上地图亦其比也。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这句话十分重要,结合其序文只字不提绘图工作,则此句很可能表达的是闰年地图与图经之别。

如此则有一问题,即上述依据《严州图经》所推测的祥符年间州郡图经的体例,是有地图的,而且地图还附有图说。这一矛盾虽然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过亦可略为疏通。其一,今所见《严州图经》之图既有图说,恰好说明地图为一独立部分。其二,虽然《严州图经》冠有地图,但是元丰年间的《吴郡图经续记》不仅无地图,其序言也只涉及闰年地图之制,而并没有将地图作为图经之项目,所述图经制度亦为“载言”之事业。<sup>④</sup> 因此,图经中地图之有无,似乎并无一定之规,也并不是图经之核心,图经之要在于“载言”。

绍兴间董弁《严州重修图经序》中,尚未着意强调图经体例中地图之重要,但是南宋后期的相关论述中,则多对地图之有无甚为关注。如嘉定二年(1209)楼鑰《海昌图经序》云:“先祖太师岐公,顷岁由工部郎知处州,作《括苍志》,绘郡境及城府为图,以便览观,遂不失图经之旨。”<sup>⑤</sup> 则在南宋后期,人们开始强调绘制地图是图经本来旨趣之核心。而此时,郡邑志实际

① 陈公亮修:《严州图经》,第227页。

② 参见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7页。后者对前者的观点作了调整。

③ 欧阳修:《居士集》卷40《菱溪石记》,《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78—580页。

④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吴郡图经续记》卷首,第1—2页。

⑤ 楼鑰:《海昌图经序》,谈迁:《海昌外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清康熙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上已经得到全面发展。因此，或可作以下推测，即图经中图与经之关系成为重要问题，很可能是在南宋以后，郡邑志开始盛行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强化，并为后世所演化。

6. 祥符元年，编修诸道图经的同时，因戚纶之请，创立一新制度：凡车驾出处即修图经进纳，赐中书、枢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讨，自是皆然。

需要指出的是，因车驾所过而修撰之书，并不都以图经为名。如景德四年二月乙亥，命翰林侍讲学士邢昺等編集车驾所经古迹，<sup>①</sup>最后邢昺等上《景德朝陵地里记》60卷。<sup>②</sup>这从另一面表明图经修撰的主要目的在于“载言”。

稍后，知杂御史赵湘亦于祥符三年十二月癸酉，请依《周礼》置土训、诵训，纂录所经山川古迹风俗，以资宸览。此奏得准，诏直集贤院钱易、直史馆陈越、秘阁校理刘筠、集贤校理宋绶掌其事，每顿进一卷。<sup>③</sup>《宋史·钱易传》云，“祀汾阴，幸亳州，命修车驾所过图经”。<sup>④</sup>至祥符六年冬十月甲戌，朝廷又命直集贤院石中立等修车驾所过图经，以备顾问。<sup>⑤</sup>钱易依然参与其中，至十二月庚辰，又命晏殊同修。<sup>⑥</sup>此当为一事之不同诏命，前后相继。

此种因帝王巡幸而修纂之图经，虽属特制，但与地方州郡平时所上一样，也是王朝统治之重要部分，不过它对礼仪场所、圣贤古迹注入了更多的关怀。前引《玉海》指出宋真宗游幸洛阳时视为疏略的《西京图经》，需要补充的只是“古迹”。其原因在于，它首先要体现的是君临天下的象征意义，而拥有神圣合法性的仪式场所和圣贤古迹，无疑是宣誓这种象征意义的最佳空间。

### （三）州郡图经由案牒而著述及其渐趋式微

如上所述，祥符间各州郡图经编撰明确要求“选文学官校正”，实为州郡图经辑纂人员之一大变化。之前，地方州郡图经多为胥吏循例编集而上，只有编修天下图经以成一代著述时方差遣文学官僚。而此种变化，对于图经在宋代之演变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推进了州郡图经由案牒而为著述的进程；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个过程，在王朝政治变迁的运动中，它又逐渐被其他形式所取代。

大中祥符四年颁布给各州郡的图经，其性质显然已经不是案牒文书，而是书籍形式的著述。虽然诏令各州郡，以后遇闰依本录进，仍然希望采用一种案牒的方式搜集地理资料，但是实际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此后地方州郡图经编撰工作，日益趋向著述形式。

档案性质的地理资料，乃君临天下之象征，只需要定期“依本录进”即可，就其本质而言，无须阐述编撰之宗旨，也不能掺杂私义。另外，也没有著述权，具有匿名性。而著述则大不同，无论官、私，皆有所宗旨与意趣，都有独立主张。尤其是私著，更有一己之胸臆，不得不发。同时，其编撰者皆有声明著述之权利。元丰七年，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正体现了这种变化。观其序言，已然全无案牒痕迹，实为文人著述。今节引如下：

吴为古郡，其图志相传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编辑而上，其详略盖

① 《长编》卷 65，景德四年二月乙亥，第 1445 页。

② 《长编》卷 69，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乙巳，第 1556 页。

③ 《长编》卷 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癸酉，第 1698—1699 页。

④ 《宋史》卷 317《钱惟演附从弟易传》，第 10344 页。引用时标点有改动。按：《玉海》卷 14 将此事系于“祥符四年正月戊子”。（第 273—275 页）

⑤ 《长编》卷 81，大中祥符六年冬十月甲戌，第 1850 页。《宋史》卷 263《石熙载附子中立传》，第 9104 页。

⑥ 《玉海》卷 14《地理·地理书》，“祥符州县图经”条，第 273—275 页。

系乎其人。……又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记述也。元丰初，朝请大夫临淄晏公出守是邦……尝顾敝庐语长文曰：“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缀辑……唯子能为之也。”……于是，参考载籍，探摭旧闻，作《图经续记》三卷。凡《图经》已备者不录，素所未知则阙如也。会晏公罢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议大夫武宁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临长文所居，谓曰：“闻子尝为《图经续记》矣，余愿观焉。”于是稍加润饰，缮写以献。置诸郡府，用备谘阅，固可以质凝滞，根利病，资议论不为虚语也。方圣上睿谟神烈……倘或申命方州更定图籍，则此书庶几有取也。事有缺略，犹当刊补。其古今文章，别为《吴门总集》云。元丰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许州司户参军朱长文上。<sup>①</sup>

虽然《吴郡图经续记》内容依旧十分简略，但是著述之意已跃然面前。兹略引卷上“户口”条，以见一斑：

西汉之会稽郡，举今二浙之地皆在焉……国朝与民休息，稼穡丰殖。大中祥符四年，有户六万六千一百三十九。有祥符至于今七十余年间……元丰三年，有户一十九万九千八百九十二，有丁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八十七。……当节之以礼，和之以乐，跻民与尧舜三代之隆，此其时哉。<sup>②</sup>

州郡图经由案牘文书一变而为文人著述，在知识形式上无疑是一大进步，其修撰自然也更为讲究。然而与之相随的却是宋代州郡图经作为地理知识汇集方式的日益式微。

依据朱长文的序言，从祥符至元丰的七十余年间，吴郡似乎并未编修过新的图经。这除了表明当年朝廷“每闻依本录进”的诏令并没有得到地方州郡很好的执行以外，在一定程度上还说明，祥符以后图经的修撰不再只是机械式的案牘文书，而是地方官和地方文人展现地方政治、文化或寄托个人才情的重要著述形式。这一点，从北宋其他文人对朱氏《吴郡图经续记》的评论中可以得到佐证。元祐元年（1086）常安民在评论时强调：“观其论户口，则继之以教；陈风俗，则终之以节。至于辨幼玉之怨，正语儿之妄，纪谭生之讥，其论议深切著明，皆要自礼义。与夫牧守之贤，人物之美，事为之善，凡前言往行有足称者，莫不褒嘉叹异，重复演说，信乎所谓‘君子于言无苟’者。”<sup>③</sup>

《吴郡图经续记》于元丰七年进呈郡府后流传并不广。元符元年（1098），祝安上通判苏州权管军州事时，最初并未见到此书，而是打算在《旧经》的基础上重为修撰，及从朱长文之子朱耜处得此书，以为善，即于公库刊版。<sup>④</sup>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测，至少就苏州一郡而言，从元丰以至元符二十余年间，并没有例行之图经编修工作，其政事所需依据者仍然为《旧经》（按：此所谓《旧经》很可能是指祥符时之图经）。苏州的这一情况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至迟从元丰至元符间，即从神宗改制以后，原本作为地方地理资料例行汇集手段之一的图经，很可能已经在地方行政中基本停废。

黄鼎《四明图经序》云：“大观元年（1107），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于是，明委郡从事李茂诚等撰述。故地里之远近，户口之主客，与夫物产之异宜，贡赋之所出，

①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吴郡图经续记》卷首，第1—2页。标点有改动。按：晏公，为晏知止，元丰元年知平江军。章公，即章帖，元丰四年接任。据序文，此书初成于元丰三年，元丰七年修饰而已。

②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户口》，第7—8页。

③ 常安民：《书吴郡图经续记后》，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末，第86页。

④ 祝安上：《图经续记后序》，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末，第89页。



上而至于人物古迹释氏道流，下而至于山林江湖桥梁坊陌，微而至于羽毛鳞介花木果蔬药茗器用之类，靡不毕备。书成未几而不幸厄于兵火，遂致存者亡，全者毁，前日之所成者泯然而不见。”<sup>①</sup> 则至于大观初（此事实起于崇宁五年，考见后），北宋再次组织全国性的图经编纂活动。据《四明图经》之内容推测，当时各地州郡图经之内容大致包括：道里、主客户、物产、贡赋、山林川泽桥道（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古迹、人物、羽毛鳞介（动植物）等。记载范围虽然广泛，但是基本与此前图经相近，详于关乎王朝统治之自然与人文地理记述。此次图经修撰似为大规模的行政公务，应为北宋图经之重要事件，但因北宋末年政局鼎革之变，当时究竟有多少州郡编成，实难蠡测。

从九域图志局之设置，方有命州郡编纂图经之举动分析，图经在北宋后期的行政公务中已不是周期性的公务，而是较长间隔后因命而为之大事；各州郡不再视之为日常公牍，而以著述待之。地方官吏和文人对于此次编撰给予极大重视和很高评价，成为地方政治、文化事业中需要大加称颂或反复称颂的业绩；编撰过程不再受制于案牍体例的条条框框，参与之官吏和文人往往依据己意，加以撰述。

文献中有关胡子美政和《鱼台图经》的记载或可为佐证：

〔政和二年（1112），〕诸路行方田，公被檄诣单州鱼台县……则又悉取案牍，以类铨次，凡山川之形、土风民谣、气俗习尚之变，城郭市井、宫庐器服之异，浮图老子神龙之祠，古今高人胜士、循吏名臣之迹，科别分为一书，号《鱼台图经》。献部使者，使者读其书，叹曰：“丞哉，丞哉，岂所谓涉笔署纸尾者耶。”<sup>②</sup>

据此，首先，该图经之编撰基本上是地方官吏个人行为，并非例行案牍。其次，该图经之编撰似乎并不是遵守一定之陈规，而是编撰者自为类例，加以取舍。第三，胡氏编撰之举被当作重要业绩在墓志铭中加以特别记述，或许正说明它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平常的政事，而是地方官吏值得褒扬的政绩。值得注意的是，叙述此事时并未提及相关源流。凡此，似可表明此类行为在当时并不普遍，但存在零星修纂图经的行为。宣和间杭州曾重修图经，<sup>③</sup> 亦可为证。

还值得关注的是，北宋后期州县图经不仅往往为官僚或士大夫之独立著述，而且还可流传销售以赢利。据淳熙《三山志》记载，长乐县“学最古，起唐乾符四年……元祐戊辰，袁正规既视事，亟议修建。邑人林通者作县图经，命鬻之，得钱二十万。县富民皆相与出力，乃仍旧殿新之。”<sup>④</sup> 戊辰即元祐三年，哲宗即位初期。既称林通为“邑人”，自非官吏，而应为当地士大夫。因地方官之命，售卖其所撰《长乐县图经》以资助本县翻建官学。虽尚未见其他相似记载，且其发生具有一定戏剧性，即使如此，这一事件亦仍可表明，图经为私人撰述之性质已为时人所接受，其官方密不示人之档案性质已得到比较彻底的改变。

至绍兴己未（1139）董弁《严州重修图经序》云：

至唐立制，凡地图，命郡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国朝定令，闰年诸州上地图。

大中祥符四年，诏儒臣修纂图经，颁下州县，俾遵承之。距今百二十有八年矣。其间

① 黄鼎：《四明图经序》，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首，《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74页。

② 孙靓：《南兰陵孙尚书大全集》卷67《和州通判胡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5册，第767—769页。

③ 施元之、顾禧、施宿注：《注东坡先生诗》卷4《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再和》，“三百六十古精庐”句注引，《宋集珍本丛刊》，第18册，第560页。

④ 梁克家纂修：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诸县庙学·长乐》，《宋元方志丛刊》，第7872页。

州名有更易，军制有升降，户口有登耗，赋税有增损，既皆不同，而又艰难以来，州县唯科敛是急趣具。目前闰年之制，寢以不举。盖职方之职废也。<sup>①</sup>

董氏将图经当作闰年制度并不完全正确，但却充分说明州郡图经作为王朝象征的地理资料收集方式，在南渡后已大体上全面停止。这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是说，南宋没有图经流传，或者没有修撰以图经为名的地理书籍。如上文所述，《严州图经》虽然成书于南宋绍兴初，淳熙间又为重修，但是其体例却反较元丰时《吴郡图经续记》更接近《祥符图经》，在形式上也更接近官文书。只是其性质已经不是官文书，不再进呈象征王朝地理统治机构的职方（或其他中央机构），成书也不是简单地由地方胥吏依据陈规旧例，依循抄录，而是由地方亲民官嘱其僚佐，“相与检订事实，各以类从”。其编撰旨趣也大为变化，所谓“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渠小补也哉。”<sup>②</sup> 因此，虽然形式上仍可看到图经的影子，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然为著述之体。

依据相关目录记载，除了上述《严州图经》在淳熙间重又编修补充以外，在淳熙、嘉定间，各地州郡图经修撰似乎再次兴起。

淳熙二年（1175）李焘至江西，“披辑旧闻，以修一路图经”。<sup>③</sup>《宋史·艺文志》有“《重修徐州图经》三卷，嘉定中撰”。<sup>④</sup>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楚州图经》2卷，“教授雪川吴莘商卿撰。太守毗陵钱之望大受，时淳熙十三年”。《衡州图经》3卷，“郡守三山孙德舆行之撰。嘉定戊寅刻。”另外《春陵图志》10卷，“教授临江章颖茂宪撰。淳熙六年，太守赵汝宜”。<sup>⑤</sup> 则淳熙、嘉定间，在南宋疆域的较大范围内兴起了图经修撰活动。

依据上引《直斋书录解题》，虽然当时仍然采用图经之名，但与北宋时期奏进朝廷的州郡图经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南宋图经多为儒学官吏之著述，并非案牘文书，也不再进奉朝廷，已经是彻底的地方性著述，往往刊刻流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地理图经。王朝统治在例行活动之外，常有非常之需和非常之举。在此类活动中编撰而成的文献，往往亦以图经相称。就宋代而言，著名者如赵珣《聚米图经》，<sup>⑥</sup>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凡此类，与前文所论州郡图经相比，皆非案牘，而为著述，故置不论。

## 二、《九域志》与“九域图志所”：权威性系统地理知识的生产

两宋之际，档案性质地理资料走向系统知识的另一个线索则是中央设官置局编撰地理书，其代表是“九域图志所”的设立与《九域志》的编撰。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所谓官修地理书，是指王朝各级政府派遣官吏，或设官立局，编撰而成的各种地理书以及这种修书的过程，而不包括王朝政治中各类地理档案文书。这一点甚

① 董舜：《严州重修图经序》，陈公亮修：《严州图经》卷首，第11—14页。

② 董舜：《严州重修图经序》，陈公亮修：《严州图经》卷首，第11—14页。

③ 徐规：《李焘年表》，《长编》，第35—91页。

④ 《宋史》卷204《艺文志三》，第5157页。

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第251、254页。

⑥ 赵珣及其《聚米图经》的详细讨论，参见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第78—80页。

为关键。因为，虽然二者都代表了王朝统治的权力意志，但是以案牒形式存在的地理文书具有匿名性，往往不具备完整的系统知识形态，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案牒，并不是可以用来在较广的范围内传播的知识，而是一种官方的私密资料。相反，官修地理书往往是以比较完整而成熟的形式存在的系统知识。它具有公开的权威性，在为王朝统治服务的同时被作为一种可靠的知识或学术，为知识阶层所接受，并进而加以发展，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官修地理书之举动，隋代之前基本以各史地理志（郡国志）为主，其他情形似不多见。不过到了隋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大业拾遗》载，大业初年，曾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即崔赜）等撰《区宇图志》一部。又因诸人所著《丹阳郡风俗》不合帝意，遂派秘书十八学士修《十郡志》（《区宇图志》）。<sup>①</sup>这是历史上大型官修地理书的重要事件。

唐代大型地理书之编撰当以《括地志》为代表。该书纂修于贞观年间，由魏王李泰延聘萧德言、顾胤、将亚卿、谢偃、宗伋等人编撰。全书 555 卷，其内容从建置沿革到人物故实，几无所不包，记述详细。<sup>②</sup>此书虽规模宏大，但实质上仍为私纂。而唐代另一部著名的地理书，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亦为独立之撰述，并非纯粹官修。<sup>③</sup>令人遗憾的是，唐代史籍中对此类地理书的具体修撰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我们知之甚少。

至于北宋，官修地理书的相关记载大为增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一，在州郡图经基础上编修天下图经，如开宝四年诏令卢多逊负责“重修天下图经”；开宝八年，宋准“受诏修定诸道图经”；以及《祥符图经》。其二，编修天下地图。如熙宁四年诏令赵彦若等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其三，编修《十道图》和《九域图（志）》。如景德四年命孙仅、戚纶重修《十道图》，元丰《九域志》等。其四，特命编撰，如景德、祥符中命编集车驾所经古迹，纂成《景德朝陵地里记》60 卷。以上多命官专领其事，一般依馆阁编修成书。

虽为特命之制，其编撰程序或管勾情形当与其他相同，唯其内容视具体要求而定，暂不论。而《十道图》、《九域图志》则在体制上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九域图志》之编撰不仅与北宋政治关系甚密，且与地理书之发展有莫大关系，尤其是“九域图志所”之设，更加深了这种影响，故详论之。

#### （一）从《十道图》到《九域图》：王朝地理学的继承

据《五代会要》记载，“十道图”与“长定格”、“循资格”等，从唐代开始成为政府“论叙官资”的一项重要依据。<sup>④</sup>《旧五代史》则载《十道图》在当时不仅是诸道州府地望次第升降的参考，同时也是确定地方官吏员额的依据。<sup>⑤</sup>

至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冬十月丁亥，权判吏部流内铨慎从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图》较

①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 602《文部一八·著书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710—2711 页。

② 辛德勇：《唐代的地理学》，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439—463 页。

③ 至于《开元三年十道图》、《天宝十道录》等的性质尚有讨论。辛德勇以为，“十道图”、“十道录”之类都是朝廷综合各州郡图经而编制的总图经——仅取文字部分，即成十道录之类；图文并取，即成十道图之类，见氏著：《唐代的地理学》，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第 439—463 页。而荣新江依据敦煌文书，认为《天宝十道录》属于官文书，见氏著：《敦煌本〈天宝十道录〉及其价值》，《九州》第 2 辑，第 116—129 页。本文认同后者的观点。

④ 王溥：《五代会要》卷 20《选事上》，同光二年（924）八月中书门下奏，第 258 页。

⑤ 《旧五代史》卷 43《唐书·明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590—591 页。

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法官亦用定刑，而户岁有登耗，未尝刊修，颇误程品。”<sup>①</sup>《十道图》俨然是宋王朝日常统治中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

但是，据乾德二年（964）有司言，《十道图》无全、邵二州名及其望，<sup>②</sup>则宋初主要还是沿用前代《十道图》，<sup>③</sup>其内容已多有疏漏。北宋初年是否重修过《十道图》，史籍并无明确记载。不过，至少到真宗景德四年，曾命知制诰孙仅、龙图阁待制戚纶重修《十道图》，然“其书不及成”。

大中祥符六年，慎从吉再次提出重修《十道图》并得到许可、开始实施：

“请差官取格式司、大理寺、刑部《十道图》及馆阁天下图经校定新本，付逐司行用。”  
诏秘阁校理慎鏞、邵焕，集贤校理晏殊校定，翰林学士王曾总领之。（天禧三年，书成，凡三卷，诏付有司）<sup>④</sup>

结合《玉海》的记载，<sup>⑤</sup>其大端如下：

1. 祥符重修时校定之资料，格式司、大理寺、刑部《十道图》似皆为旧本，而馆阁天下图经可能主要指祥符三年刚刚由李宗谔等修定的《新修诸道图经》（即《祥符图经》），这是最新的资料来源。此亦可表明，当时《十道图》之使用确实较为广泛，同时与“天下图经”非为一书，各有所指，各有所本。

2. 《玉海》所载，虽前后不无抵牾，但亦有可注意处，即此次修撰，最后成书似不再称《十道图》，而名之曰《九域图》。证据有如下几端。首先，《元丰九域志》的《进书表》说，“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时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本朝之《九域图》是也。”<sup>⑥</sup>其次，熟悉北宋馆阁掌故的程俱，在《麟台故事》中叙述此事时，径称之为“此盖详定九域图志之权舆也。”又，其在叙述《元丰九域志》得名缘故时云，“以旧书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更赐名曰《九域志》”。<sup>⑦</sup>则所谓旧书，当即指祥符至天禧间所修之书，当初成书时定名为《九域图》，但已不绘地形。

3. 关于成书时间，尚需辨析如下。《玉海》“景德重修《十道图》”条以为天禧元年（1017），而“祥符《九域图》”条却认为祥符六年成。<sup>⑧</sup>据《长编》，虽然修书缘起于祥符六年，但成书却在天禧三年。

然熙宁八年（1075）六月辛丑，刘师旦云“今《九域图》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今六十年”云云，<sup>⑨</sup>而后世亦以为即祥符六年修定。<sup>⑩</sup>实际上，王存等《进书表》云“文约事备，则

① 《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冬十月丁亥，第1851页。

② 《长编》卷5，乾德二年冬十月戊申，第133页。

③ 据《旧五代史》卷43《唐书·明宗本纪》，后唐曾经重新校订过《十道图》。（第590—591页）因此，北宋沿用的前代《十道图》，并不一定是唐代的，而很可能是经过五代重新校订的《十道图》。

④ 《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冬十月丁亥，第1851页。

⑤ 《玉海》卷14《地理·地理图》，第272、273页。按：《玉海》所记有误，应据《长编》、《宋史·艺文志》校改。

⑥ 王存：《元丰九域志进书表》，《元丰九域志》，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⑦ 程俱：《麟台故事》卷3下《修纂》，张富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0—301页。

⑧ 《玉海》卷14《地理·地理图》，第272、273页。

⑨ 《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辛丑，第6486页。

⑩ 王文楚、魏嵩山：《〈元丰九域志〉的成书及其价值》，《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1—205页；穆朝庆：《九域志考释》，《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唐之《十道图》、本朝之《九域图》是也。然自天禧以后，历年兹多，事有因革”，<sup>①</sup>明确表达了是在天禧《九域图》的基础上重修。因此，将祥符六年看作成书年代不确，应从《长编》卷81李焘夹注所云天禧三年为是。此书北宋时即有流传，吕南公《十八路地势图序》云，曾以天禧《九域书》参校《十八路图略》。<sup>②</sup>

综上，依慎从吉祥符六年十月之请，重修《十道图》，由秘阁校理慎镛、邵焕、集贤校理晏殊校定，翰林学士王曾总领其事。至天禧三年书成，名为《九域图》，凡3卷。其体例，当时已无地形图，为文字形式，以州县沿革、名号改易、等第升降、郡之姓望，以及古迹为主要内容，《元丰九域志》基本以此为准。至此，唐代《十道图》一变而为北宋《九域图》。王朝地理学的权威在新王朝得以顺利转承。

## （二）《元丰九域志》：“有地理学者”修撰

在天禧与元丰之间，尚有《皇祐方域图志》之修撰。我们怀疑它与《九域图》并不相同，而是地理图集，故暂不讨论。

至熙宁八年六月辛丑，经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之请，以《九域图》修成后六十余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遂差选有地理学者重修。命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赵彦若，获嘉县令馆阁校勘曾肇删定，仍就秘阁不置局，后赵彦若免删定。因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更赐名《九域志》。<sup>③</sup>

此次修订《九域志》，主要人员有李德刍、曾肇、王存等，依据《进书表》，应主要成于王存之手。<sup>④</sup>至于其修成年代，《进书表》并未说明。不过《宋会要辑稿》载元丰三年二月十二日，“详定朝会议注所”奏言各地土贡，注云见《元丰三年九域志》，<sup>⑤</sup>则其成书当不晚于是。据王文楚、魏嵩山考订，其政区为元丰八年之制，而正式刊行则在元祐元年以后，故《容斋随笔》卷10又称《元祐九域志》，《玉海》卷15《熙宁九域志》条引《会要》云：“元丰三年闰九月延和殿进呈，六年闰三月诏镌，八年八月颁行。”但实际上元丰八年以后仍在修订。<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长编》载元丰三年冬十月辛酉，“详定官制检讨文字光禄寺丞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十卷”。<sup>⑦</sup>此李德刍《元丰郡县志》卷数与《进书表》所言《元丰九域志》十卷相差甚大，而且《进书表》明确指出，当时没有绘制地图，并因此而改名，而此处则有《图》10卷之说。因此，若非《长编》记载舛误，则当元丰三年，在闰九月进呈《九域志》之后不久，李德刍又奏上《元丰郡县志》30卷，《图》10卷，宋人所称李德刍《九域志》或指此哉？此等细节尚需深考，暂为悬置。

此次修撰，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差选有地理学者重修”。无论赵彦若，还是李德刍、曾肇、

① 王存：《元丰九域志进书表》，《元丰九域志》，第1页。

② 吕南公：《灌园集》卷8《十八路地势图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81—82页。

③ 《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辛丑，第6486页。王存《元丰九域志进书表》，《元丰九域志》卷首，第1页。因此次编纂起于八年刘师旦之请，宋人有称《熙宁九域志》者，如嘉泰《吴兴志》卷1“建置沿革·湖州”条注引（《宋元方志丛刊》，第4680页）。

④ 王存：《元丰九域志进书表》，《元丰九域志》，第1—2页。

⑤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第5557页。

⑥ 魏嵩山、王文楚：《〈元丰九域志〉成书源流考》，《学林漫录》第5辑，1982年，第190—194页。

⑦ 《长编》卷309，元丰三年冬十月辛酉，第7505页。《宋史》卷204《艺文志三》，第5153页。《玉海》载李德刍所上《元丰郡县志》30卷、《图》10卷（第295页）。《宋会要辑稿》亦载有《元丰九域图》（第7401页）。则《元丰九域图》，指李氏所上之《图》，抑或《九域志》之别称？待考。

王存等，确乃当时所谓“有地理学者”，尤其是王存。他对《九域志》编撰的改动看似些微，实则充分体现了对地理学的认识。<sup>①</sup>其书编撰虽然“缀辑大体，略仿前书”，但他在审度后作出了明确调整，即“郡名之下附以氏族所出，以《禹贡》、《周官》考之，皆无其文，且非当世先务，兹不复著。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志之。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今则凡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sup>②</sup>

王存对于在体例上去姓氏之郡望，补前书之所阙，规范道里广轮之数甚为得意。姓氏之郡望，至于唐代中后期已基本衰落。入宋，在政治生活中已无价值，因此王存将其剔除实为自然。而补前书之所阙看似简单，但却是一件细致繁琐的工作，非有深厚的地理知识修养，难以在短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取舍。至于道里广轮之数，前代著述虽然多有四至，然其记述并无定规，而王存将之规范统一，实为一大进步。充分体现了王存对于如何表达地点之间的空间关系有着十分深入的认识。应该说，这在王朝地理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不同地点之间相互空间关系的表达方式，成为古代地理学描述不同层级聚落之间相互空间关系的典范。这一方法，直到近代西方地理学传入之前，一直为中国王朝地理学所遵循。王存之所以能够取得进步，当与北宋在地理测量方面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并非凭空而来。据吴其昌的研究，用《元丰九域志》道里广轮数据复原的宋代政区图，与近代西法绘制之地图，相互之间的差异甚微。<sup>③</sup>由此，即可见其空间数据之准确，当多得之实测资料。正是在王存等“有地理学者”的努力下，地理资料转化为系统的地理知识，不仅成为统治之地理手册，同时也成为地理描述之典范性著述。一种系统的权威性的地理描述方式得到发展，并产生长期而广泛的影响。

《元丰九域志》体例较为简略，主要包括北宋立国以来之沿革、地里（即道里广轮之数）、主客户、土贡、等第、县之乡数、镇名、主要山川河渠古迹名称。其之所以如此，当由其作用决定，即如祥符六年慎从吉所言，乃格式司用以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法官用以定刑。<sup>④</sup>需要说明者，所谓法官用以定刑，即大理寺、刑部等依据其所记载州县之名号、等第、道里等决定官吏、人犯之流放、贬谪等。正是上述原因，所以《九域志》之记载重在州县废置、名号改易、等第升降、道里广轮，一旦这些数据因年久而不敷应用，即需及时校订。这也是《九域志》修成后，依然随时补充修订的原因所在。

不过对于《九域志》之简略，很快就有人表示不满。绍圣四年（1097）四月丁卯，兵部侍郎黄裳要求诏请职方取四方州郡山川、风俗、民事、地物、古迹之类，讲求其详，集为一书，以备《九域志》之阙。此事得到批准，诏秘书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收藏，以备检阅。<sup>⑤</sup>后有《新定九域志》流行。今所见，其政区、沿革、地里、户口、土贡等与《元丰九域志》基本相同，唯增“古迹”一门。其成书时间，据《玉海》卷15“熙宁《都水名山记》”条记载，大观中当已流行，而今本所载政区与《元丰九域志》基本相同，凡崇宁以后更置之府州军监名称一概不载，因此王文楚、魏嵩山以为成书在崇宁以前。

通过《元丰九域志》与《新定九域志》体例与具体地理数据之比较，愈可体现出前者在王

① 王存生平与学术，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9—48页。

② 王存：《元丰九域志进书表》，《元丰九域志》，第1—2页。

③ 吴其昌：《宋三京图考》，《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8年，第195—208页。

④ 《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冬十月丁亥，第1851页。原文为言《十道图》之作用，而《九域志》实即承《十道图》而来，因此其作用当相同。

⑤ 《长编》卷491，绍圣四年四月丁卯，第11657页。

朝地理学中之重要价值和地位，而成就其历史地位的重要因素，实乃“有地理学者”修撰所致。后此之《九域志》编撰，或能成书如《新定九域志》，然其地理学意味并无突破；或如“九域图志所”，十数年而不能成一书。除其他因素外，其最重要者当在于修撰之人恐多非“有地理学者”，而仅仅是所谓文人学士而已。

### （三）“九域图志所”：系统地理知识编撰中的权力

天禧《九域图》与《元丰九域志》皆为官修，但只是就馆修撰，并没有专门设立修书局。绍圣重修以后不久，情形一变，专门设“九域图志所”（亦称“详定九域图志所”、“九域图志局”）。此一事件，不仅开北宋官修地理书鼎盛之局面，也对北宋后期政局产生直接影响，而我们更关注其在地理书发展方面的影响。

“九域图志所”设置时间，<sup>①</sup> 朱弁认为在“崇宁末”；<sup>②</sup> 程俱云“崇宁以后”；<sup>③</sup> 黄鼎则以为在“大观元年”；<sup>④</sup> 乾道《四明图经》有“本州大观初所编《九域志》”<sup>⑤</sup> 的记载。罗澹《四明志序》云：“大观初，朝廷置九域图志局，令州郡各编纂以进。”<sup>⑥</sup> 则其设置在崇宁末还是大观初，尚需推求。

据沈与求《朝请大夫盛公行状》，盛允升“崇宁元年官制行，授登仕郎……签判杭州，未几代回。……还旧职。是时东平吕公惠卿帅杭，被旨释才吏访境内逸迹，备修九域图志。……即一以属公。公搜抉无遗，事数月书成，奏御，迁通直郎通判扬州。大观二年……”<sup>⑦</sup> 吕惠卿曾三度知杭州，分别为元符三年四月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至八月；崇宁五年八月至大观元年四月。<sup>⑧</sup> 以时间长短度之，当以崇宁五年至大观元年任内为可能。又，盛允升因书成而迁判扬州，至大观二年离任，按宋代地方官正常三年一替之制，则其迁判扬州亦当在崇宁五年。结合朱弁、程俱的记载，可以推断“九域图志所”之设立应在崇宁五年。

至于黄鼎等人大观元年之记载，亦可解。因崇宁五年后即为大观元年。以北宋主客户数据为例，政和三年八月九日淮南路转运副使徐闳中云“《九域志》在元丰间主客户共一千六百余万，大观初已二千九百一万”，<sup>⑨</sup> 则“九域图志所”正式发布的数据即以大观元年为断。从上引黄鼎等人记载，亦可见当时各州郡着手为“九域图志所”编纂地理资料，实际上多始于大观元年。因此，时人误以为朝廷于大观元年创制“九域图志所”，实属正常。

从崇宁至于宣和间，陆续被命为“九域图志所”编修官者甚多，如蔡京、王黼、何志同等，其中何志同长期领局，主持实际编修事务。就笔者目力所及还有：蔡攸、滕庚、陆修、蔡经国、

① 关于九域图志所，可参见郭声波：《宋朝官方文化机构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宋朝官方文化机构考述（下）》，《宋代文化研究》第10辑，2001年，第173—196页。后文将前文崇宁元年开书局，修正为崇宁间。陈蔚松：《九域图志局考实》，《历史文献研究》第20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74页。

② 朱弁：《曲洧旧闻》卷5，“本朝九域志”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314页。

③ 程俱：《麟台故事》卷2《职掌》，第95页。

④ 黄鼎：《四明图经序》，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首，《宋元方志丛刊》，第4874页。

⑤ 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1《祠庙三》“饮飞庙”条，《宋元方志丛刊》，第4879页。

⑥ 罗澹：《四明志序》，胡榘等纂修：宝庆《四明志》卷首，《宋元方志丛刊》，第4989页。

⑦ 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卷12《朝请大夫盛公行状》，《宋集珍本丛刊》，第39册，第343—345页。

⑧ 周淙纂修：乾道《临安志》卷3《牧守》，《宋元方志丛刊》，第3248—3249页。

⑨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第5009页。

翁彦约、汪藻、傅冲益、柳璩、黄伯思、张守、吴侗、赵子书等。王黼即因编修九域图志时，得领何志同赏识而仕途腾达。<sup>①</sup>而蔡京再入相所加衔之一，就有“详定九域图志”。<sup>②</sup>二人皆曾为左右朝政之权相，由此可见“九域图志所”在北宋后期政局中之重要地位。正如《麟台故事》所言：“以从官为详定，余官为参详，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修。其进用视秘书省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抵由此途出，合秘书省之士，至数十人。”<sup>③</sup>“九域图志所”作为官修地理书之编撰机构，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北宋晚期仕途的一条捷径。其中所蕴含的地理知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引人深思。这不仅是北宋官修地理书所达致的鼎盛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似乎亦为罕见。

然此种权力之鼎盛，并没有结出饱满的果实，而是“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sup>④</sup>这除了书局自身的问题外，亦为北宋后期政局变动所致，这或许正体现了权力与知识关系的另一面。

宣和二年（1120）六月戊寅，蔡京致仕，王黼掌权，“阳顺人心，悉反其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并会要、六典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盐钞法不复比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罢礼制局并修书五十八所。<sup>⑤</sup>“九域图志所”之罢即在其时。据程俱《麟台故事》云，王黼得政之初，欲尽去冗费，专事燕山，于是在京诸局皆罢，不复置官，“九域图志令省官分修而已”。当时王黼担心“贵倖恐复造膝开陈，卒不可罢”，得旨亟行，“令局官当日罢书库官，人吏皆即赴吏部”，从而“文书草查皆散失”。<sup>⑥</sup>因此，宣和二年六月“九域图志所”罢局后，虽然尚“令省官分修”，但因王黼之极端手段在先，故最终未能成书。

“九域图志所”虽未修成新的《九域图志》，但是当时为备修，曾诏令全国提供资料。其要求进呈之内容，依据相关史料，大致有如下几类。其一，如黄鼎所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乾道《四明图经》等径称《九域志》），图经内容包括“地里之远近，户口之主客，与夫物产之异宜，贡赋之所出，上而至于人物古迹释道流，下而至于山林江湖桥梁坊陌，微而至于羽毛鳞介花木果蔬药茗器用之类，靡不毕备”。<sup>⑦</sup>其二，如沈与求所记，“被旨释才吏访境内逸迹，备修《九域图志》”。<sup>⑧</sup>其三，其他个人所著或编纂之地理等各类书。如葛腾仲《中散兄诗集序》所言，其人“椽琅琊日，尝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应典籍者为书，上于九域图志局”。<sup>⑨</sup>政和元年新汉州教授陈坤臣进《郡国人物志》150卷，送编修九域志所看详。<sup>⑩</sup>上述进呈之资料，皆由“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定夺去取，这不仅决定了相关内容在系统地理知识中的位置，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撰述者们的政治前途。

而“九域图志所”工作之主要内容，更直接反映出知识系统化编撰过程中权威之作用。现今所见，有以下几端。首先，校订州县户口数。如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蔡攸、何志同奏言，以河北“德州主客户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才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户二万二千

① 《宋史》卷470《王黼传》，第13681页。

② 《宋史》卷472《蔡京附子攸传》，第13731页。

③ 程俱：《麟台故事》卷2《职掌》，第95页。

④ 朱弁：《曲洧旧闻》卷5，“本朝九域志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314页。

⑤ 《宋史》卷470《王黼传》，第13682页；卷22《徽宗本纪四》，第406页。

⑥ 程俱：《麟台故事》卷2《职掌》，第95页。

⑦ 黄鼎：《四明图经序》，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首，《宋元方志丛刊》，第4874页。

⑧ 沈与求：《沈忠敏公龟溪集》卷12《朝请大夫盛公行状》，第343—345页。

⑨ 葛腾仲：《丹阳集》卷8《中散兄诗集序》，《宋集珍本丛刊》，第32册，第579页。

⑩ 《宋会要辑稿·崇儒五》，第2260页。



四百七十七，而口才三万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数，率三户四口”，指出其所取天下户口数类多不实，要求下诏申严法令，选委逐路监司别作审核，审括实数闻奏。<sup>①</sup>

其次，依据新的户籍资料，核对州郡等第和名号，然后奏请相应机构予以修正。如政和元年七月二十六日，“详定九域图志”何志同奏，指出当时虽距建隆初已经百五十余年，户口亦数倍于前，但是县之等第仍旧，如“齐州历城，户九千七百，今为紧；临邑，万七千户，乃为中；杭州临安，户万二千，今为望；盐官，户二万四千，乃为上。”因此“乞命有司，参酌旧制，量户口多寡之数，以为诸县升降之法，使县之第名常与户版相应。”<sup>②</sup>又如政和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尚书省据“九域图志所”意见，“勘会兴仁府为东辅，青州为齐郡，潍州为北海郡”。<sup>③</sup>而州县名号等第之修正，其过程往往繁复，九域图志所常依据新的情况提出建议，供其他政府部门作出调整。如政和二年五月十六日，“详定九域图志所”依据兴仁府之例，奏请“颍昌、开德府合冠以南北辅，兼延安等五府属县已依本所申请罢称次赤畿，即四辅所治县自合正名次赤，余县合为次畿，所贵格法从一”。<sup>④</sup>

州县等第名号问题并不至于此，“九域图志所”编修时皆需一一审核、奏进。如政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何志同奏：“编修京西南北路一十七州军图志，看详文字，数内上、望，次序倒置，或阙郡名，若坊、郭、乡、里等处名称与殿阁或祖宗陵名相犯，及流传鄙俗，难以书于地志，垂示久远，各已参拟改立于傍通格及册内贴说进呈。”<sup>⑤</sup>

第三，校订全国州县并省废置情况。如政和四年四月十四日，“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蔡经国札，称“旧《九域图志》，并载麟州管下新秦、银城、连谷三县，各有所管堡寨，山川界分。本州今供却只作新秦等县，其银城、连谷并属新秦，本所致未敢便作新秦一县修立，合取自朝廷指挥。诏：麟州管下新秦等三县，今后只以新秦县称呼，其银城、连谷县并废罢，并入新秦县。”<sup>⑥</sup>

上述数项，皆与《元丰九域志》内容相当，因此推测其他见于元丰志者，亦皆为此次修撰之项目。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修撰过程中，“九域图志所”对相关资料的审慎取舍，对其他部门之运作有直接的指导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威机构在制造系统地理知识的权威的同时，将地理知识转化为直接的政治权威。

虽然“九域图志所”于宣和二年六月罢局，终止了地理知识编撰权力鼎盛的局面。但不久朝廷又开始编修《汴都志》，如柳约等“（宣和）四年，兼充编修《汴都志》编类官”。<sup>⑦</sup>宣和六年八月十四日，以尚书主客员外郎杜从古、大宗正丞徐兢编修《汴都志》，米友仁并为措置管勾官。<sup>⑧</sup>虽然相关记载较少，但既然上述设置情形似与“九域图志所”相类，权威性系统地理知识的生产方式显然得到延续。而此种设官置局，专门编修地理书的方式，对于后来州郡地理书的修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所谓地方志之生产，多半源于此类修撰。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第5009页。

② 《宋会要辑稿·方域七》，第7438页。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五》，第7389页。

④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第7328页。

⑤ 《宋会要辑稿·方域五》，第7395页。

⑥ 《宋会要辑稿·方域六》，第7408页。

⑦ 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29《左朝议大夫充敷文阁待制致仕柳公约神道碑》，《宋集珍本丛刊》，第51册，第357—359页。

⑧ 《宋会要辑稿·崇儒三》，第2208页。

### 三、小结与余论

宋初，州郡一级政区的图经，作为官文书向上奏进，属于档案。朝廷根据这些州郡图经，按照统治之需要，再组织人员修撰成“天下图经”，成一代之著述。至于《祥符图经》的编撰，即使州郡奏进图经，亦明确要求“选文学官校正”，实为州郡图经辑纂人员之一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地方州郡图经由胥吏编集而上的传统，同时也开始逐渐改变州郡地理知识的档案属性。大中祥符四年写定后颁布给各州郡的图经，已非档案文书，而是著述。故此后诏令各州郡遇闰依本录进之图经，形式上虽然还留有案牘的痕迹，但其内涵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即使是颁布的这种著述性质的图经样式，依据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等记载，很可能也行之未远，到宋神宗时期，已很少有州郡遵循。代之而起的，是不定期的、以私人或地方官名义出现的地方地理著述。这一变化推进了州郡图经由档案资料而为系统著述的进程，使档案知识转而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经过加工、删削等整饬，能够在较广范围内传播的地理书，其知识从档案性质的秘密的权力资料，转而为具有权威性和可公开传播的知识。

而崇宁间“九域图志所”的设置，则进一步改变了依据地方定期奏报资料编撰王朝地理书的做法，一变而为直接设置编撰机构，以临时奏进之资料及各类著述为基础，编辑王朝地理书。至此，定期的州郡地理资料奏进制度以变相的方式由中央行政予以废止，王朝地理知识完全从档案式资料的生产走向设官置局的系统性知识生产。

档案性质的地理资料，乃君临天下之象征，只需要定期“依本录进”即可，就其本质而言，无须阐述编撰之宗旨，也不能掺杂私义。另外，也没有著述权，具有匿名性。它是中央统一权力的象征。而著述则大不相同，无论官、私，皆有所宗旨与意趣，都有独立、自由之主张。尤其是私著，更是一己之胸臆。同时，其编撰者皆有声明著述之权利。在北宋祥符以后，尤其是崇宁设九域图志所后，州郡地理著述对州郡地理档案的取代，既是知识形式的改变，同时也反映了中央与地方间权力运作和权力让渡的变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随着王朝地理，从秘密的档案资料逐渐过渡到专家著述的系统地理知识过程中，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化。社会科举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对地理知识的发展，正面的影响是推动了知识的系统化和部分自觉，成为可以通过著述传递的知识；负面的影响则是逐渐使知识的技术性传统被日益地边缘化，知识的文学性特征和文人化生产日益占据主流。这种情况与中国绘画艺术领域中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极为相似。

〔作者潘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97〕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辑：李红岩）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strengt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Japanese flee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its ports were second only to that of Britain; it beca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forces.

**The System of “Five Ranks of Nobilit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Nobility in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Liu Yuan (62)

The system of five ranks of nobility (五等爵制) was never really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Their political system was one of inner and outer domains. The outer domains system of the vassal lords included the titles of Hou, Dian, Nan, Wei and Bangbo, but out of these five ranks, only the titles Hou and Nan belonged to the vassal lords. Gong, Bo and Zi essentially referred respectively to one who was advanced in years and held a high position; to the Bozhang and the eldest son of the principal wife; and to the head of the clan and the eldest son of the principal lineage. Thus these three titles were widely used for the nobility and not limited to the vassal lord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royal house was in decline, and the Son of Heaven was incapable of restraining the various nobles’ expansion and amalgamation of their inner and outer domains. As a result, the “inner and outer domains” system collapsed. The nobility with the rank of Bo (formerly an internal title), who had become rivals of the Son of Heaven, those holding the rank of Hou and Nan (formerly external titles), and the ruler of the barbarian tribes, who bore the title of Zi, together with Dukes of Song, descendants of the Yin kings, frequently met in alliances and on the battlefield. The records of the official historians produced the invented order of precedence of “Gong, Hou, Bo, Zi, and Na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is order not only concealed the system of inner and outer domains of the Yin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 system of Hou, Dian, Nan, Wei and Bangbo for the vassal lords, but also provided ready-made material for Warring States scholars to set up their ideal models of a kingly system with five ranks of nobility, five or even nine degrees of mourning apparel, etc. in accordance with military exploits.

**Map Guides (图经 *Tuj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Illustrated Gazetteer of Nine Regions*: from Source of Material to Systematic Knowledge**

Pan Sheng (79)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map guides (图经 *tujing*) covering the prefectur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zhou* and *jun* were treated as official documents; they were submitted to court and filed in the archives. The court then organized personnel to compil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fectural guides, *Tianxia Tujing* (天下图经 A Map Guide to the Country), as required for government needs. Until the compilation of the *Xiangfu Map Guide* (祥符图经), most of the map guides submitted by the prefectures were compiled by sub-official functionaries, but

thereafter they were compiled by the literati. This chang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Song map guides. On the one hand, it advanced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prefectural map guides moved from being archival materials to systematic works, so that archival knowledge became systematic in nature and circulated as geographical texts in a relatively wide sphere. The knowledge they contained ceased to be secret archival material for the powerful and became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that could be openly disseminated. On the other hand, as dynastic politics changed, the map guide gradually yielded ground to other forms. The setting up of *Illustrated Gazetteer of the Nine Regions* Bureau in Chongning (1102-1106) further changed the way in which imperial geographical works were compiled on the basis of regular reports sent up by local governments. Instead, the court set up a compilation bureau to compile imperial geographies on the basis of the provisional materials repor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works of all kinds. At this point, the system by which the prefectures sent up geographic materials was basically abolished, as imperial geographic knowledge moved from the produc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type texts to systematic knowledge production by a specific agency and specific personnel.

#### **Eunomia: Solon' s Ideal Political System**

Zhang Wei (97)

The series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s implemented by the early Athenian legislator Solon were aimed at realizing *eunomia*, an ideal state order. The *eunomia* praised in Solon' s "To the Polis" represents a state political order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But in specific poetry performances, the concept of *eunomia* goes beyond the reach of political activity so that its realization is ultimately at the level of heart and mind, thus achieving a combination of mental order and the ideal political order. Thus Solon the poet and Solon the legislator complement each other. Solon' s poems were not tools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ir poetics spring from a deeper level of mastery of politics.

#### **Herodotus' History of Persia and How It Shaped the Intellectual Elite' s View of Persia in Ancient Greece——A Comparative Study of Book 3 of *The History* and the Behistun Inscription**

Lü Houliang (111)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count of Darius' ascending the throne given in Book 3 of Herodotus' *History* and the Behistun Inscription, an important official document of the Persian Empire. Herodotus' record of the relevant names, genealogy, and basic narrative are highly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Behistun Inscription, and his historical sources may well have derived indirectly from the latter. However, in writing his narrative Herodotus was misled by the official ideology of the Persian Empire under Darius as reflected in the Behistun Inscription and